

胡明一著

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胡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

疑待人要在有疑處

不疑

胡適



适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在文化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反动立场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学理基础的。他以私人的负责任言论的方式出来批评，“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他说：

“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个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恳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胡适严肃指出，国民党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必须及时“自觉的纠正”，否则，刻意讳饰，刻意坚持，甚至刻意封杀批评的声音和负责的舆论，“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

胡适传



论

胡适传论下卷

胡適

胡

这是目前最权威的胡适传记
第一版史料定稿的高质量的
宏大、永久的学术传记

胡適

了
压
中
立
想
的
情
面
，
拜
呢？

胡适传论

胡明
胡适传论
下卷

是海内外内、现代、胡适学术传记
第一部史料丰富、水平较高的胡适学术传记



第七章 政治妊娠的胎动与流产

三十七 好人政治与好人政府

1922年5月7日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英文名 The Endeavor)创刊,这是胡适“谈政治”的一个刊物,也是胡适回国之后“谈政治”的开端。胡适谈政治、办政论刊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对国家、民族的休咎盛衰,对政治的清明秽浊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不闻不问,不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政治的糜烂、政府的腐败已臻极致,胡适一颗匡国救世的赤心开始激烈地跳动,时代已经不容许他在政治上再沉默,天下事或许因为我——还有我与你、我与他——的努力还有救。作为创刊献词的《努力歌》里的一段,胡适说: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天下事的关键在“好人”的“努力”。胡适忍不住唱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的下手处在哪里?“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后努力歌》)胡适的“努力”的下手处便是办《努力》

周刊,通过政治舆论来努力干预政治,监督与引导政治向清明处运动。^①他呼吁“好人”出来干政治,办政府,一步一步把政治引上轨道。第2号的《努力》周报便登载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李大钊等十六位名贤具签的政治意见提纲《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个“政治主张”引起社会舆论界的巨大反响,胡适与《努力》周报立刻进入了政治改革讨论的中心位置。从第7号的《努力》开始,胡适独辟《这一周》政治评论栏目,对时政发表直捷的意见:要求、忠告、呼吁、建议、批评、规箴、警告。从《努力》周报开始,经后来的《新月》、《独立评论》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国》,我们不仅可以完整地看到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政治灵魂的心路历程,而且还能惊悚地读到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的失败史——以胡适个人为典型代表的政治妊娠胎动至流产的悲剧性演绎。

胡适曾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这个“忍不住的新努力”就是胡适在《我的歧路》中所谓的“歧路”。胡适在关于自己踏上这个“歧路”的自述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留美七年间,他一面热心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宪政辩护真挚地奔走号呼,一面高度注意世界政治的演化。他是“世界学生会”的主席,又是“国际政策会”的会员,又是“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为政治投入过巨大的精力与时间,写过很多文章,出过很大的风头。为了坚决己见力排众议,他还不止一次当过“众矢之的”。1916年他的一篇“国际非攻”的论文曾获得过美国最高奖金。他的《胡适留学日记》中留下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议论、资料、图片、政治领袖演说辞和统计图表。1912年和1916年的美国大选中,他作为一个来自异国采风观国的年青留学生竟比美国公民还要热烈地投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狂热地沉浸在对美国政治的观察学

习、模仿训练中……只是后来迫在眉睫的哲学博士课业和郁然勃兴的文学革命的讨论才稍稍冷却了青年胡适的政治热情。1917 回国时，他目睹了中国思想界的落后，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学术界的空白，“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哲学与文学是初回国的四五年里他全力关注的，他写的近百万字的文章，也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全是有关思想文艺的。1919 年 6 月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看到国内新舆论界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于是，他发愤要想谈政治，做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作为开始谈政治的“导论”，“本文”没有来得及炮制出笼，《每周评论》就被封禁了。胡适的政论文章流产的同时，他的谈政治的热心也冷却了下来。

从《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禁到胡适踏上“政治歧路”的两年八个月当中，胡适一是忙与病分不出身来谈政治，搞舆论，二是“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哲学、文学）来巴结我的新欢（政治）”，他基本上是在“等”。“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这里胡适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对新舆论界的蔑视与憎恶，明白表示他现在出来谈政治便是被国内这个“新舆论界”激出来或者说逼出来的。胡适愤激地说：“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胡适原来一直是等着，盼望着国内有人出来办一份有正面主张又有学理水平的政论报纸。我们注意到胡适《十七年的回顾》(1920年10月作)中对《时报》的厚望：“《时报》是……一个立过大功的先锋，我希望他不必抛弃了先锋的地位，我希望他发愤向前努力替社会开先路。”我们也注意到他的《祝〈白话晚报〉》(1922年3月作)中发自内心深处的一段话：“这个时候，何苦又去添出一种报呢？我以为此时在北京，别无办新报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出一个有主张的报。”“有主张”，当然主要是政治上有主张，是这个时候北京办报的唯一理由，也是唯一目的。胡适还进一步说：“这个时代的报纸，不但应该有主张，还应该要有学理与见解做主张的根据。根据正确的观察，参用相当的学理，加上公开的态度，发为公开的主张，那才是‘禁得起一驳’的主张了。”这实际上已是他正在筹办中的《努力》周刊的办刊宗旨了。显然《时报》与《白话晚报》没有能做到符合胡适的意愿与期望，自己出来办报，宣传自己的主张便责无旁贷了。胡适在1922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八年八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想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这段话中，“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系指《努力》的出版申请于三天前(2月4日)遭到政府新闻官署的驳回而说的；梁任公吃亏在于做总长云云，系回答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班朋友——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等的劝告。“商务”的朋友们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他们劝胡适：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

反对胡适办报谈政治、作政论的，不仅有商务印书馆的朋友

们,《晨报》副刊的孙伏庐反对最激烈。他写信给胡适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子?……我实在为先生的光阴,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可惜。”在孙伏庐看来,大多数人所以敬仰胡适,“胡适之”三个字之所以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换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国哲学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国语文学史,能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的《红楼梦》,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话文。现在先生抛弃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治家与政党》^②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故孙伏庐声称:“我是痴想竭我绵薄,将已被政治史夺了去的先生,替文化史争回来。”把胡适从政治史里争夺回文化史里,或者说防止胡适从文化史里滑下向政治史里,人似不少,胡适原来的北大学生们都存此想。如傅斯年在1920年8月从国外寄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希望胡适以自己的识与力投到学问事业中去,“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但是热情支持胡适办报谈政治的却也大有人在,首先就是他的挚友丁文江。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他积极主张一班朋友组织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和提倡政治改革的实际准备。他批评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对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胡适自己当然也感到了“实际的政治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丁文江不仅怂恿胡适政治上“下海”，而且自己在《努力》上也拼命写文章。据他自己统计，《努力》的一年半时间，他共做了一百二十三栏的文章，恰合十万字（见1924年1月13日致胡适信）。除此，胡适的老朋友任叔永、陈衡哲夫妇也积极支持，胡适搞文学革命时的老对手梅光迪也出乎意外地热情支持胡适谈政治、做政论。他在《努力》创办伊始的1922年5月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称：“《努力》周报所刊政治主张及其言论，多合弟意。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抬胡适的政治主张，目的似在抑胡适的白话文与实验主义。但他说的“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两条当是实情。胡适的“主张”都参以相当的学理，正确的观察，公开的态度，这便保证他们是务实的讨论，是负责任的研究问题。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其本身便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全力支持胡适的还有胡适的朋友常燕生。常燕生不仅明确希望胡适“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而且指明：“我们现在只能走这政治的一步，过了这一步再走到工艺的一步，只有科学工艺是康庄大道，但你非过了这政治的一关不成。”他断定：谈政治的《努力》的历史功劳必不在谈思想文艺的《新青年》之下。

夹在两种真诚的希望之间的胡适这时已经态度明朗，言论的冲动已经压掩不住，但他的公开回答却还是强调了他的学理。首先，他指出他现在谈政治与以前谈白话文、谈思想文艺一样都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他说：“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我的歧路》）他也为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在政论上的应用做了一个解释：“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是承认

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这才是真进化。”因此胡适强调，“我不曾变节”，“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有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

胡适纠正孙伏庐的“政治史夺去，文化史争回”的说法，指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他过去谈思想文艺，现在谈政治都是会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又都是文化史的本分的内容，谈政治本身也是在文化史之内，正不需“夺去”“争回”的。不过他声明，他谈政治的比例是一比七，即七天之中，一天谈政治，编《努力》，“其余六天仍旧去研究我的哲学与文学”。最后，胡适还宣布他谈政治并不妨碍他继续在思想文艺领域里打鬼捉妖，思想文艺领域的工作犹很繁重犹很迫切。他直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这一点埋在胡适心中的思想情结在他后来谈政治彻底“止了壁”、光荣失败后，立即迅速膨胀，并回归原位，便是胡适在1923年10月作的关于《努力》的总结《一年半的回顾》中的那个结论：“从此以后《努力》的同人渐渐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去努力了。那个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胡适这里说的“新的”方向其实正就是他在谈政治之前的老方向或原来的方向，何新之有？不过到那时他的“思想的革新”意识更峻深了，更急迫了。

胡适的政治主张——以十六人具签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开宣言形式表示出来——的核心意见，便是公认以“好政府”为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好政府”的概念实际诞生在一年前的1921年6月。6月18日胡适对来访的安徽籍旧国会议员汪建刚说：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

——《胡适的日记》

这里“有政府主义”与“好政府主义”下的黑点是胡适自己加的。1921年10月4日胡适在《双十节的鬼歌》的诗里正式提出“造一个好政府”。这首诗胡适是怀着强烈的政治激情写的，其中核心的一段云：“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好政府”对“鸟政府”。胡适公开地、系统地、完整地阐述“好政府主义”是他于1921年8月5日在安庆的一次公开讲演的主要内容^③（胡适称：“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这个讲演我们后面再谈。胡适已经明确把“好政府”作为“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公共目标”，“其实行的条件”便是：“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他说：“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好政府”首先是由“好人”组合的“政府”，胡适这里强调“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1922年10月27日日记）这里的好人政府与好人政治与梁启超提倡过的“贤人政治”有一点明显区别：梁氏提倡“贤人政治”时是“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而胡适这里的好人政治，凭藉的已是一个时代的新人。《我们的政治主张》邀约签名时有意排拒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便是最好的明证，林长民（宗孟）调侃梁氏的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是“好人”们也未必全是时代新人，他们也不少是暮气重重的。故梁漱溟——十六位签名的“好人”之一

——写信对胡适说：“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所以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矣。”“吾曹好人”出来发挥“吾曹之好者”，这也正是胡适好人政治——好政府的根本思路，也是胡适谋求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他说：“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胡适 1922 年 5 月 11 日写出的。那一天他的日记中称：“做一篇《我们的政治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加入。”第二天在蔡元培家开会，文本定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结果赞成这个“政治主张”并愿意签名的共十六人：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即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13 日交记者发电至上海，并交通社传播，14 日出版的《努力》第 2 号上刊出全文。

《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内容分五个部分。第一，“政治改革的目标”，也即是确立“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第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消极方面要

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方面则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第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要求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政府是“宪政的”,即“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公开的”,主要是财政的公开与用人考试的公开;“有计划的”,胡适对这一条十分看重,他以后又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计划是效率的源头”,那怕一个平庸的计划也胜过于无计划的瞎摸索。第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号召“好人”们(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出来干政治,组织政府,与恶势力斗争。第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具体有六项:(1)南北问题必须解决,但不可用武力统一,只可召开南北和会议和,(2)议和,恢复 1917 年解散的国会等四条件;(3)裁兵;(4)裁官,实行“考试任官”制度;(5)选举制度的改革;(6)财政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统筹预算,平衡收支。这一份有系统的政治纲领文件的核心宗旨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它的基本内涵有三点:一、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治组织也是人类造的或者说发明的最大工具。因为许多事业是个人或小团体小组织不能做到的,或大组织能做得更好的,故人类有利用这种大工具,组建这种大组织的需要。政府的存在,好政府的建设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二、这种工具是一种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法律制度都是这种权力的表现。权力若无共同的目标,必冲突,必至于互相抵消。政治与法律的权力因有组织,因有公共目标,故可指引各方面的能力向一个共同的趋向走去,既可避免冲突,又可增进效率。三、这种工具,若用得得当,可发生绝大的效果,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惰性极大,偏向保守。若靠自然的演进,必致没

有进步,或进步极慢。政府的机关,若利用得当,乃是督促社会进步、打破社会惰性的唯一利器。政府就是现代人类必须也必然要建立的这个大工具,这个大工具性能质地弄得好,或是说由好人们来使用来操作,必将导致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进步与福祉,防止许许多多人间惨剧与不幸故事的发生与绵延。

胡适进一步强调这种“工具主义的政府观”的三条引伸意义:一、由此可立一个政府评估的标准:政府是社会用来谋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工具,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妨碍或摧残社会的公共福利的是恶政府。二、由此可得一个民治(人民参政)的原理:工具是须时时修理的。政府是用人做成的工具,更须时时监督修理。因为人都有揽权的天性,又都有滥用权力的趋势。无论怎样好人,若久揽大权,若无监督,总会滥用他的威权去谋他的私利;私利若与公共福利冲突时,他就会滥用他的威权去摧残公共的福利了。故这个工具有严密监督和随时改组修正的必要。凡宪法、公法、议会等等都是根据这个原理的。三、由此可得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不良,修好它。修不好时,另换一件。政府不良,监督它,修正它;它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它。一部分的不良,去了这部分;全部不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个!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

胡适这里重在建设一个“大工具”——人民参政的即民治的好政府,力求避免破坏性的“革命原理”。故他强调“监督修正”权力的设施与操作。民治无他,由人民来参与治理,人民参与治理必然要体现在一个选举的机制上,他是实施所谓“监督修正”的首要条件。我们注意到胡适的“政治主张”里的有关“选举”改革的三条细目都是针对北京的北洋政府弊端的现实:“(一)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二)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

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三)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前两条已接近当代民主政治的实施规范，代表了政治发展的趋势，后一条则可具体纠正北洋政府的实际弊端。当时黄炎培就觉得这后一条最可有实效，他说：“选举法实有修改的必要。现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优秀分子为全国所仰望能解决国家大问题的，但是照现在的选举法，吾敢断言这种人决不会当选。只是你们所讲的几种方法‘大大的减少名额’，吾绝对赞成。其余两条，是否即可以达到使优秀分子当选的目的？还不敢说。但是吾并没有反对这主张。”这种就“政治主张”中具体条目的具体意见的讨论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本身就是说明社会优秀分子群已经被胡适他们的“政治主张”吸引过来了，并把全社会的公共关注投入到讨论这一份“政治主张”中去。

无疑，赞同并热切希望这份“政治主张”能得到推行并唤起国中千万“好人”们奋勇出来，为政治清明和政府革新而战的大有其人。^④比如一位叫梅祖芬的读者向《努力》发表的意见便很有代表性：“那一次的政治改革不是少数的智识阶级作先锋呢？所以我希望全国的好人们只管大胆的去，只要你宗旨纯正，适合全国的需要，一般民众自然会跟着你走的。……你们须知道政治改革的担子是全个落在你们的肩上！”他还告诫：“作改革运动的人切不可犹豫不决，书生气不可太重，看时机到，就大胆的去，万不可瞻前顾后，空论也是少发才对，要多留些工夫谈谈实事。”他对“好人”的希望是：“好人以私德为基础，以牺牲负责为职志，在改革时是以普遍的大结合为手段”，“切不可把枝节问题夹杂其中，以致互相纷争，为恶势力所乘”。他又说：“国家政治入轨道之后，一国内不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反对的政党，时常作对抗的运动以维持政治的均衡。”但未入轨道之前的过渡

时，则“好人”们应团结一致，“打破恶势力，驱除国民的公敌”。胡适很赞同这位梅祖芬的意见，他说：“这个意见是很对的，欧美各国的政党，当欧洲大战时，都能牺牲党见，同心向国家的公敌作战。我们觉得这十年的民国史上，政党的狭窄态度，彼此不容忍对方的主张，专闹意见，确是大乱的一个大原因。我个人以为现在只希望大家能持一点历史的眼光，认明从前许多争执的无谓，用忏悔的态度，大家一齐朝着‘好政府’的一个平凡的目标上做去。此时的最大需要在于宣传这个平凡的公共目标，叫大家认清我们的公敌是恶势力的恶政府，我们的责任是向这恶政府作战。”

另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胡适们的“政治主张”太和平了，是“取改良的手段”，不能满足他们的“手枪炸弹”的胃口和“先全盘破坏后分工建设的革命”要求。在一篇署名王振钧、郑振夏、董秋芳等八人的讨论文字中，他们宣称：“我们平素相信政治的彻底改造在平民革命……中国已到千疮百孔的病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经山穷水尽。”因此他们主张，“令全国的平民，下牺牲的决心，作最后的决斗”，发起一场“全国平民自觉自决的革命”。“革不良制度不良政治的革命”，“先全盘破坏后分工建设的革命”。具体手段是一面“到民间去”运动群众，一面用手枪炸弹，“刺戟他们的情感”。胡适回答道：取革命手段或改良手段，“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这里胡适似乎并不反对取革命手段，但革命手段后的一点一滴改革、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具体的解决，却仍是艰巨十分的根本任务。胡适在《这一周》的开篇就有过一段十分明确的宣言：

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因为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之法，“先全盘破坏后分工建设”的思路也显然不现实，“本来破坏与建设都不是绝对的相反”。胡适纠正他们的思路道：“有时破坏即是建设，有时建设即是破坏，有时破坏必须在先，有时破坏自然跟着建设而来，有时破坏与建设同时并进。等到鸡蛋壳破裂时，小鸡也已下地了。”这只小鸡就是大家合力建设起来的好人政治。孵出这只小鸡，让小鸡下地才是唯一的目的。建设是主要的，建设在进行中，破坏也跟着在进行。和平的手段是主要的，革命乃是不得已采用的最后手段。这里胡适又纠正他们对“到民间去”口号的理解：“‘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

好人政府有过一次实践的机会，但是这次实践太短命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与持久的深入。这次实践无可奈何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胡适对好人政府的期望，并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有关政治革新的理论思考。1922年8月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三位参与《我们的政治主张》设计的“好人”入阁参政。王先代理

总理，“代阁”总辞后“真除”，受命正式组阁。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罗文干出任财政总长，在人员组成上已接近胡适理想中的好人政府了。胡适说：“虽不能做到清一色渐渐趋向凑一色了。”故认为这正是实行他的好人政治的机会。所以王宠惠内阁成立之初，胡适就发表短评，重提“宪法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三个基本原则。他明确说：“我们现在对他先提出第三个要求，我们希望他先定一个大政方针，然后上台，我们希望他抱一个计划而来，为这个计划的失败而去。无计划的上台，无计划的下台，是我们决不希望于王氏的！”（8月7日—13日《这一周》）接着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一个平庸的建议》，为王宠惠内阁提出一套“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⑤，还亲自参加王宠惠内阁的茶会，很诚恳地向内阁主要成员讨论具体的施政方针。王宠惠内阁的后台是（直系的）吴佩孚，吴氏实际上也是十六个提出政治主张的人当时共同信仰的权威人物，连李大钊也十分敬佩他的人品与才具^⑥，很寄予厚望。但国会的后台则是曹锟，在新内阁与国会关于分配经费和借款诸问题闹翻至决裂后，国会议长吴景濂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与奥国签订贷款协定时有纳贿行为，伙同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设法取得总统黎元洪手令，于11月19日将罗文干逮捕。在人为制造的财政丑闻压力下，王宠惠内阁不得不于25日全体总辞，宣布下台。王宠惠虽只做了三个月的总理，但不能讥为“无计划的上台”与“无计划的下台”。只是他们的计划订得不周密，没有顾全现实，在与国会的正面冲突中不懂策略，硬干蛮干，很有点为坚持财政原则而被恶势力联合逼下台的味道。故胡适在失望的同时，非常理解好人的尴尬处境，既要在人格上可靠清白，又要在政治上有手段有作为，确实是不容易的。他在《这一周》（11月20日—26日）上说：“我们理想中的好人，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一是才具上可以有为。